

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

董昕·杨泽宇*

-
- I. 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的布局与发展
 - II. 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流通
 - III. 结语
-

■ 摘要

初建于1909年的朝鲜银行最初只是负责处理朝鲜地区的事务。在日本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业务不断迅速扩张，朝鲜银行券亦随之扩张了其流通范围和流通数量。朝鲜银行券不仅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被视为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建立金本位的重要工具。然而，受到朝鲜银行自身债务等因素的困扰，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渗透逐渐放缓，未能实现日本政府的企图。

关键词：朝鲜银行券，中国东北地区，货币流通，金融侵略

*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研究生
dxhelen2008@163.com

■ Abstract

The Circulation of Banknotes of Bank of Korea in Northeast China

Xin DONG · Zeyu YANG

(Liaol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The Bank of Korea, originally established in 1909, was only responsible for handling affairs in the peninsula region. With the support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e business of Bank of Korea in Northeast China expanded rapidly, and the banknotes of Bank of Korea also expanded their circulation scope and quantity. Banknotes of Bank of Korea not on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Japan's economic aggression against Northeast China, but were also seen as important tools for establishing a gold standard in Northeast China and even the entire country. However,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debt of Bank of Korea themselves, the penetration of banknotes of Bank of Korea in Northeast China had gradually slowed down, failing to achiev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Key-Words : Banknotes of Bank of Korea, Northeast China, currency circulation, financial aggression.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渗透力度，组建起一系列金融机构。在这之中，又以朝鲜银行（简称鲜银）、横滨正金银行（简称正金银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这三大特种银行势力为盛。在这三家机构中，朝鲜银行的实力最为雄厚，规模最大时在中国东北地区设有18家分支机构。它被日本政府定位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央银行”，负责实施各项重要的金融政策，发行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地区流通。

学界对于朝鲜银行券的研究，一般是在针对该行或日资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时，在相关机构产生或者银行业务特点梳理时提及，¹⁾ 或是针对大连金银建制及奉票等币种的研究中偶有提到，²⁾ 但对朝鲜银行券的发展历程和影响如此之深的原因并没有进行专门地梳理和探究。本文借助有关朝鲜银行的一手史料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³⁾ 对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其各阶段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1) 姜建清. 蒋立场. 2016,《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北京:中信出版社;吴树实.《伪满洲中央银行与“朝鲜银行”货币发行制度之比较研究》,《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 第6期。
 - 2) 燕红忠. 2021,《中日货币战争史(1906-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3) 朝鮮銀行. 1919,《鮮滿經濟十年史》,首尔(京城):朝鮮銀行;朝鮮銀行. 1934,《朝鮮銀行二十五年史》,首尔(京城):朝鮮銀行;(日)松原纯一. 1939,《朝鮮銀行三十年的回顾》,首尔(京城):朝鮮銀行調査課;(日)朝鮮銀行史研究会. 1987,《朝鮮銀行史》,东京:東洋經濟新報社;(日)多田井喜生. 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东京:筑摩書房. 等等。

I. 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的布局与发展

朝鲜银行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878年。当时，日本第一国立银行（简称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一个分行，总裁涉沢荣一积极推动第一国立银行在韩国的扩展和银行券的发行，并促使韩国政府将第一国立银行定位为韩国的中央银行，明确将其银行券性质设为中央银行券。⁴⁾为了更好地控制韩国地区，1909年6月，韩国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颁布了《韩国中央银行法》，并在10月成立了名义上由韩国政府主办和管理，但实际上完全由日本控制的韩国中央银行。此后，韩国政府在1910年8月22日被迫与日方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访条约规定“韩国皇帝陛下将关于韩国全部一切统治权，完全且永久让于日本国皇帝陛下”。⁵⁾同年8月29日，还发布了一道勅令，宣布将“韩国”的国号更改为“朝鲜”。由于国号的变更，韩国中央银行的名称也必须进行相应修改。1911年3月，政府颁布了《朝鲜银行法》，具体规定如下：韩国中央银行将更名为朝鲜银行，其资本额保持不变，仍为1000万日元，发行货币为在朝鲜境内具有无限法偿货币属性的金圆纸币（即朝鲜银行券）；发行准备包括等额的金币、生金银⁶⁾（可超过支付准备金的四分之一）或日本银行兑换券；支付准备金除其本行持有的3000万元国债证券外，任何额外的发行都必须以政府债券、其它证券和商业票据作为担保。⁷⁾

一开始，朝鲜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朝鲜本土经济。因此，它当时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临时办事点，即其前身韩国银行为解决

4) (日)多田井喜生. 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 东京: 筑摩書房, 第31页, 第41页。

5) (日)日本外务省.1978,《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东京: 东京原书房, 第340页。

6) 生金银指尚未被融化提炼的天然黄金白银, 生金银属于银行收购和管理的范围。

7) (日)高久敏男.1915,《朝鮮銀行五年志》, 首尔(京城): 朝鮮銀行, 第19页。

决处理中朝贸易问题在1909年设立的安东办事点。伴随着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强，朝鲜银行加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网点布局，于1913年在奉天（今沈阳）设立了分行。随后，又陆续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20余处，包括大连、旅顺、长春、营口、吉林、四平街、郑家屯、辽阳、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图们、锦州、哈尔滨、龙井村、傅家甸、北京、天津、青岛、济南、上海等地。这些机构中的大部分集中设在东北地区，共计18处，⁸⁾ 朝鲜银行券也随之流通于中国东北地区及关内主要城市。

II. 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流通

日俄战争结束后，随着日本移民数量的增加，如金银汇率和汇兑费用等一系列金融问题开始显露。居住在“南满洲”的日本商人，开始对日本政府表达不满。日本政府意识到，如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机构不充足，其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将会面临诸多棘手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决定于1907年将关东都督府的收支方式改为金本位，同时探索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支付方式转换为金券的方法。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现代金融机构，积极寻求积累资本，以确保其对外侵略的经济基础。

根据当时的情况，日本政府认为：“目前有横滨正金银行，但作为这样的商业银行，无法实现满洲经营的目标。……既而提出三种方案：一、设立特种银行，二、日本银行或者朝鲜银行设立分行，三、特许正金银行发行金票。并以朝鲜银行作为最优解。”⁹⁾ 根据实际情况，日本内阁

8) 贾士毅.1934,《民国续财政史(六)》,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37页。

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1986,《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7)》,上海:上

决定特别准许朝鲜银行在当时的“满洲”设立分行。当时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向该行发布命令，令其在短期内迅速在奉天、长春、大连等地开设分行，以便发行朝鲜银行券并办理汇兑等金融业务。本文将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情况分为三个时段介绍。

1. 朝鲜银行券流通的快速扩张时期 (1912-1920)

最初，东北境内的朝鲜银行券（也称金票）大多是随着商民与朝鲜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或者在华日商交易流入的，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微乎其微。

1912年，以农业为主的朝鲜在经历了朝鲜银行主导的币制改革后，对外贸易呈现出巨额入超的情况仍得不到解决。作为本地区中央银行的朝鲜银行急需巨额现金来偿还外债，因自身的现金及外汇储备不足，朝鲜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鲜银行便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东北地区，企图通过安奉铁路¹⁰⁾和对应港埠加大中朝贸易量，使中国东北地区形成出超状态，来缓解朝鲜的危急情况。即通过购入处于出超地位的中国东北地区货物的输出汇票，弥补朝鲜持续入超所产生的对外债务。¹¹⁾ 这一政策的实施，让金票开始在安奉铁路沿线普遍流通。

1913年之后，朝鲜银行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中国东北地区，不断在该地区扩大其营业范围。一战爆发后的几年中，日本利用战时经济环境，加大对附属殖民地和其他地区的投资和建设。1916年10月寺内正毅

海人民出版社,第1020页。

10) 从当时中国东北的安东(今丹东)到奉天(今沈阳)的铁路。

11) 文春美,2021,《寺内内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与西原借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0(3),第144-145页。

内阁上台后，提出“日中经济提携”口号，并把“鲜满经济一体化”定为国策，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作为在“鲜满一体化”战略中寺内内阁“桥头堡”的朝鲜银行，被政府授予金票发行权等权力，业务范围和银行券的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当时，日本政府对此前正金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业务开展状况十分不满。1917年6月8日，日本寺内内阁决定给予朝鲜银行代理日本政府国库收支的特权，并准其将业务范围扩张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山东及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同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二一七号敕令》后，朝鲜银行完全取代横滨正金银行成为全面负责中国东北地区金融和财政事务的“中央银行”，兼营商业银行业务，朝鲜银行券也成为一定区域内强制流通的“法定货币”。朝鲜银行券的发行总额度及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额逐年攀升（参见表<1>）。

表<1> 1916-1918年朝鲜银行券发行总额及其在中国东北境内流通额¹²⁾

(单位：元)

年份	发行总额	中国东北境内流通额	中国东北流通额占比
1916年	46,627,080	11,598,444	24.87%
1917年	67,364,000	18,290,087	27.15%
1918年	115,523,670	34,587,818	29.94%

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维持在远东的影响力，准备开展军事行动。1918年5月16日和19日，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治下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¹³⁾ 这两项协定的签署使日本军方可以在中国东北至俄国贝加尔湖以东地

12) 张家骥.2017,《中华币制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76-277页。

13) 曲振涛.张新知.2007,《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09页。

区展开军事行动时进入中国境内，还可以指挥北洋政府的部队作战和使用中东铁路，为日本开展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银行的相关人士意识到：在出兵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朝鲜银行也将扩大其经营范围，站在帝国势力范围内的大舞台上”的机遇来临。7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确定了“在西西伯利亚和北满洲使用的军事费种类，将使用朝鲜银行券或金币兑换军用手票……在军用手票难以流通的区域，应采取尽可能促进朝鲜银行券流通”¹⁴⁾的军费方针和支付方式。

同年9月，朝鲜银行根据政府和军方的要求，在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线的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以及中国东北北部的满洲里等地设立派出所，开始处理国库资金的汇款以及军票、金票与卢布的兑换业务。不过，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当时日本军票遭到中国东北地区百姓的强烈抵制。安国祥、张曾渠在1918年10月25日的联名呈报中提到：“日军在哈埠发行军用手票，日本商铺均已通用，中国商家尚未行使。”此外，该呈报还提到，道里哈尔滨总商会和道外滨江商会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商会“密喻各商铺钱号，毋得行使此项军用手票。”¹⁵⁾因此，日军被迫采取以金票替换军票使用的策略。当时日本驻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课长山内胜雄曾提及：“1918年9月，日军(被)派遣去西伯利亚，于是发行军票，但其流通却受到了阻挠，不得不兑换正金及朝鲜银行的纸币。”¹⁶⁾《哈尔滨市志》中亦有相关记载，“日本干涉军出兵西伯利亚，哈尔滨成

14) (日)多田井喜生.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东京:筑摩書房,第167页,第169页。

15) 安国祥·张曾编.《关于日军在哈使用军用手票问题的呈》; 哈尔滨市档案馆.1991.《哈尔滨经济资料文集(4):金融·财政》,哈尔滨:内部发行,第182页。

16) (日)山内胜雄. 1923,《哈尔滨金融机关现状》,哈尔滨市档案馆.1991.《哈尔滨经济资料文集(4):金融·财政》,哈尔滨:内部发行,第183页。

为日本北上的兵站。日军在哈尔滨及北满一带采购军用物品时，一度使用军用手票，由于不被群众接受，乃由朝鲜银行哈尔滨支行设立军票交换所，以军票兑换日本银行券或金票后，作为军费支出使用。”¹⁷⁾ 这一举措使朝鲜银行券随着日本军队的行军路线从中国东北的北部一直深入到远东西伯利亚，取代了信用受损的卢布，使得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西伯利亚等环绕日本海地区的货币都“统一”为“日本圆”的设想成为现实。

据资料显示，日本军队在出兵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总共耗资超过4,900万元，其中支出的朝鲜银行券为2,758万元，占半数以上。此外，根据大藏省理财局国库课对1919年2月东部西伯利亚的货币流通状况进行的统计，显示当地货币流通总额为2,918.3万元，其中朝鲜银行券占63%，为1,845万元。¹⁸⁾ 明显可以看出，朝鲜银行金票利用这次出兵在中国东北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十分迅速。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引发的华俄道胜银行的衰败，以及其发行的“羌帖”¹⁹⁾不断贬值的情况，加速了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北部的扩张。1918年以前，沙俄的“羌帖”曾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一度垄断金融市场，中东铁路沿线市镇的工商业者和当地商民都多以“羌帖”作为交易中计价和支付的手段，形成了“东三省全境与俄之地无异”的局面。然而，1918年后，“羌帖”的急剧贬值导致了其货币市场的崩溃，“羌帖”在哈尔滨等地的价格一落千丈。战前，日元每元合0.9686卢布，而到1917年末时，日元每元能合到8.55卢布，到1919年11月时竟达到69卢布。普通商民手中的“羌帖”无法行使，亦无处回笼兑换。仅在黑龙江的克山县、

17) 邓焕文.1995,《哈尔滨市志·金融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31页。

18) (日)多田井喜生.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东京:筑摩書房,第218页。

19) 指各种卢布纸币。

库玛尔河金矿局、肇东县、海拉尔、龙镇县等地就造成了240万元的损失。²⁰⁾

当时，朝鲜银行凭借日军进军西伯利亚的契机，快速推广了金票的流通。各商家为外债所迫，只得用动产、不动产向朝鲜银行抵押借款，朝鲜银行券瞬间席卷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如在黑河，各商家“因羌帖陡成废纸，无法周转，乃息借金票三千余万元。”²¹⁾ 1920年的《银行周报》也曾提到：“朝鲜银行在东三省境内，无不大放金票。凡信用借款，动产与不动产均可自由前往抵押，值十押七，绝不留难。房产被押者最多者，推哈尔滨、黑龙江、吉林等埠，全埠总押去十分之七。盖北满各埠，本系俄人之势力圈，市面交易，皆以羌洋为本位。自去秋俄人忽自贬羌帖五十倍，致各商家皆不能支持。朝鲜行趁此机会，遂大放金票，而各埠之房屋，遂多被日人收去，是日人直欲以破纸收买东三省也。”²²⁾ 朝鲜银行券因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贷款总额逐年攀升（参见表<2>）。

表<2> 1914及1919年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营情况²³⁾ (单位：元)

年份	贷款总额	回收总额	年末账面余额
1914年	47,366,000	46,609,000	3,308,000
1919年	1,355,179,000	1,308,468,000	111,764,000

在1914年到1919年的五年里，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年末贷款余额从330.8万日元猛增至1.11亿日元，²⁴⁾ 朝鲜银行券的整体发行额也

20) 曲振涛·张新知.2007,《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77-78页。

21) 《各埠金融及商况：北满（華商所受金票之損失）》(Jan.18,1921),《银行周报》5(3).

22) 《杂纂：东三省日本人之经济政策》(Aug.3,1920),《银行周报》4(28).

23) 朝鮮銀行.1934,朝鮮銀行二十五年史,首尔(京城):朝鮮銀行,第130页。

从一战爆发时的1960万日元增加到1919年末的1.636亿日元，增长了8.4倍，²⁵⁾ 可谓惊人。这种爆炸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日军的在华活动。大量的金票通过日军出征西伯利亚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得以流通，提高了金票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大量金票的滥发，使得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物价上涨严重，大量市场物资通过金票被日军掠夺一空，给当地的百姓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灾难。

2. 朝鲜银行券流通的停滞和衰退时期 (1921-1923)

《凡尔赛条约》签订后，英美不再热衷出兵干涉西伯利亚，转向恢复经济。反观日本，由于西伯利亚作为其地缘战略最重要的一环，一旦撤出，则意味着削弱日本在整个远东的影响力。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他13个参战国家都撤出西伯利亚地区时，日军继续驻扎在该地区。²⁶⁾

在经济衰退的打击下，日本各家银行也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朝鲜银行。同时，朝鲜银行也因日军军事行动的受阻，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营出现危机，日本政府不得不打破原定的军事计划，于1921年4月将驻扎在中国东北东部地区的日军撤离。日军西伯利亚远征的失败，让已经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取得一定影响力的朝鲜

24) 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在票面上注明：“持票人可以在朝鲜银行兑换金圆或日本银行券”。实际上，金票在中国东北境内概不兑换，仅可在当时朝鲜银行的总行兑换。一般情况下，两者的价值常常相等，汇价随着日本的经济金融形势而涨落。《吉林金融研究》编辑部.1987,《东北货币史》，长春（《吉林金融研究》专刊），第57-58页。该资料是根据伪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资料科编辑的《满洲货币史》和《满洲币制年表》翻译的，译名为《东北货币史》。

25) 朝鲜银行.1934,《朝鲜银行二十五年史》，首尔(京城):朝鲜银行,第132页。

26)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2013,《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国际秩序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31页。

银行及其金票受到严重打击，该地区的银行事务所几乎全部关停，金票流通也几乎完全停滞。以哈尔滨为例，当时的在华日人曾描述：“1920年世界经济恐慌的降临以及日本西伯利亚撤兵，使金票流通政策受到极大挫折”，中国地方政府在此时又推出促进哈大洋流通的诸项政策，“逐渐排斥金票的预兆已有萌芽，昔日饱经辛酸苦痛，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日本商权的基础，已处于即将毁灭的状态。”²⁷⁾

1921年的金银建制风潮是金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发行进一步停滞与衰落的关键。在金银建制风潮爆发之前，被内阁冷落的正金银行与朝鲜银行的冲突加剧，或明或暗地阻挠朝鲜银行政策的推行。此外，大连银钞交易所的设立，以及专门开设的金票和钞票²⁸⁾的兑换业务，使得在关东州和满铁属地成为“法定货币”的朝鲜银行券变成当时热门的投机商品之一。银钞交易所的成交量通常是大连交易所特产交易量的几倍，甚至十几倍。银钞交易所中，正金银行大连支店每天公布以钞票100元兑换朝鲜银行券的市场行市，行情好坏完全是由正金银行所操控。²⁹⁾ 为了尽快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并能获得“出色”的业绩，朝鲜银行大田董事一方面联系日本关东厅强制推行金本位，另一方面带头督促大连支店和满铁沿线支店的经理们，对于支持金本位交易的人“几乎盲目地提供贷款”。朝鲜银行以有价证券作为担保的贷款从1920年的600万日元激增到次年的2000万日元。其中，大连支店增加了900万日元，奉天支店增加了310万日元。³⁰⁾

朝鲜银行和日本关东厅的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与商民的强烈反

27) 安平，解放前哈尔滨的日资银行；哈尔滨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九辑：金融专辑》，哈尔滨（内部发行），第111-112页。

28) 钞票，指正金银行发行的银本位货币。

29) (日)多田井喜生，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东京：筑摩書房，第276页。

30) (日)多田井喜生，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东京：筑摩書房，第281页。

对，中国百姓排日情绪大增。大连华商公议会随即召开特别大会集议决定，自1921年4月18日起，该会不再参加大连交易所的交易活动。之后，4月22日，该会联合大连商业会议所等九家组织，举行共同反对日本强制推行金本位的活动，大连交易所的诸项交易数量急剧下滑。5月14日，王永江、谈国桓等人代表张作霖向日方就其强制推行金本位一事提出抗议。次日，哈尔滨等地官员也向当地的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希望日方取消相关活动。中国外交部认为日本的做法让中国商人损失巨大，于6月17日正式对日本代理公使吉田伊三郎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在大连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命令。7月中旬，由奉天总商会提出的对日排斥计划书提交给了北京政府，文中包含13条具体措施及意见，请求政府发放给各地总商会，号召各总商会团结一致，反对日本的无耻行径。文中特别强调，要求东北地区所有交易必须以奉小洋票为交易单位，如若违反，商会不予承认，并决定自当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是日起，东北地区的中国商人开始拒绝使用日本的金本位货币进行交易，商户反抗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商民亦纷纷声援东北地区。北京各团体就在外交联合会的议案中专门提及关于大连交易所的金本位问题，并发表声明必将支持东北地区商人抵制此项措施，并联合北京银行公会等团体与日方交涉。

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中国政府、商人和百姓反对金建活动，与大连交易所关系密切的日本商人和横滨正金银行也加入到反对金建的风潮当中，他们联合东三省各地商会等组织举行反对和抗议活动。1921年4月19日，各方团体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与关东厅就此事会晤，就拟继续实行银本位制进行交涉。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回到大连后，各团体再次至关东厅拜访，请求日本当局撤销强制使用金本位制的命令，继续实行银本位制。4月22日，当地的十几名中日商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大连交易所继续实行银本位制同盟会”，抵制金本位制的推行。由于金

银建制风潮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与三井等大型日资企业交易的中间商无力承担亏损，中日贸易停滞，并且这些企业认为如果放任这种危机且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可能会影响到中日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各企业的正常商业运转。1922年8月1日，以三井、铃木、日清、三菱等大型日资企业为首的贸易商共计27人亦联合递交请愿书，反对强制推行金本位，希望继续实行银本位制。³¹⁾

面对这种情况，朝鲜银行和日本关东厅为保证金本位制在大连的顺利推行，对于中方的抗议行为采取了高压措施。他们威胁并恐吓中国百姓，甚至采取了诸如驱除离境的特殊行动。除强制手段外，朝鲜银行还采取了分化抗议团体的手段，即“对于主张金建者，不问其人品如何、职业如何，一律予以金钱的援助”，还“刊印拥护金建理由书数万本，分送各报纸要求援助。”³²⁾

但是，这些措施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随着事件不断发酵，日本政府认识到“(朝鲜银行) 金票的发行仅限于满铁沿线，虽说在哈尔滨地区有部分流通，其流通区域仅限于(铁路) 沿线左右不足五华里，稍稍偏离铁路线的腹地，依然是银本位货币的天下。”³³⁾ 金票还不足以与其他银本位货币相抗衡。1922年关东厅长官山县伊三郎辞职后，由并不主张快速转向金本位的伊集院彦吉接替。同年12月，金本位强硬派代表人物朝鲜银行的大田董事意外去世。这基本上等于宣告银建制取得了胜利。

金银建制之争失败后，朝鲜银行损失惨重。1923年6月底，总贷款金额3.61亿日元中，1.34亿日元的固定贷款无法获得利息，9600万日元

31) 燕红忠、李裕威.2019,《外国纸币何以能在近代中国长期流通?——东北竞争性货币市场及其启示》,《财经研究》45(9),第13页。

32) 《大连金建牵动日本政局》(Mar.13,1922),上海:《民国日报》,第3版。

33) 满洲事情案内所.1936,《満州に於ける通貨金融の過去及現在》,长春(新京):满洲事情案内所报告(满洲事情案内所报告36),第458页。

无法收回本金，视为亏损。大连支店的经理小西春雄也说：“无论我如何向中国商人解释，他们都不愿抛弃银本位。可是，银行的交易和客户的要求都不合理，使得银行造成了数千万日元的损失。”³⁴⁾

由于朝鲜银行采取了过度扩张的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自身在特定地区的影响力，却危机重重。1923年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对日态度不断强硬，东北地区的反日运动也逐渐高涨，加之日本经历的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经济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其本国的大量日资中小企业遭受亏损或破产。这一系列事件也引发了朝鲜银行的债务危机。然而，面对风险，高层并未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成为压垮朝鲜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金票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1924年，作为“朝鲜产业考察团”一员的大阪每日新闻经济记者池田龙藏提出：“（关于朝鲜银行）稍加实际调查，不难发现其在朝鲜国内都做得相当稳健，如在鲜银的亏损中，朝鲜国内的部分不到六分之一。因此，朝鲜银行陷入经营性破产的最大根源，可以概括为拥有大量日本、满洲以及盘踞在中国的企业的不良贷款和拖欠的贷款。”³⁵⁾ 这种大规模的不良债权，严重影响了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及朝鲜银行券在该地区的发行和流通，甚至成为该行没有完成日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侵略目标的主要因素之一。

3. 朝鲜银行券流通的缓慢恢复时期(1924-1931)

前一时期中，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量和地区影响力因受自身债务危机、强制推行金本位的失败、日本西伯利亚撤军以及朝鲜与日本的经济低迷等一系列因素影响，遭到严重冲击，濒临破产边

34) (日)多田井喜生.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东京:筑摩書房,第283页。

35) (日)池田龍藏.1925,《朝鮮經濟管見》,大阪:巖松堂,第7页。

缘，急需寻找解决之策。

为此，刚刚就任总裁的野中清，立即于1924年2月12日分别向财务省（前身为大藏省）与日本银行申请了年利率5%、期限为10年的两笔低息贷款，金额分别为5000万和1500万日元，企图通过运作这些资金获利后，偿还之前所欠的款项。同时，为了建立由财务省主导的不良债务处理体系，朝鲜银行的监督权也从朝鲜总督转移到了财务大臣手中，但这些举措仍未能让朝鲜银行的重振取得实质性进展。

此时，因面临破产边缘，朝鲜银行已成为日本金融界恢复活力的一大阻碍。于是，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朝鲜银行的援助力度。到1925年，日本政府向其贷款已高达6900万日元，日本银行提供的1500万日元贷款的利率也从年利5%下降至2%，还额外提供了500万日元的特别贷款。接着，财务省决定自1925年4月对朝鲜银行进行“彻底整顿”，这些举措主要包括：银行资本金从5000万日元减少至2500万日元，取消1925年上半年的股息，之后的股息仅为5%，政府持股部分不派发股息；关闭四平街、吉林、郑家屯等地的分行和出張所等机构；进行大批裁员和降薪；大幅缩减银行开支；罢免野中总裁³⁶⁾和副总裁铃木穆等。³⁷⁾

虽然朝鲜银行此时面临着诸多困难，朝鲜银行券在朝鲜以及日本本土也愈显颓势，但在中国东北地区，该行金票的流通却在这一时期得以缓慢的恢复和发展，流通额度有小幅增涨且保持稳定态势（参见表<3>）。

36) 注:1925年7月,铃木鸠吉取代野中清任朝鲜银行第五任总裁。

37) (日)松原纯一.1939,《朝鲜银行三十年の回顾》,首尔(京城):朝鮮銀行調査課,第20页。

表<3> 1917—1930年朝鲜银行金票在中国东北地区流通数量表³⁸⁾ (单位:元)

时间	金票发行总额	在中国东北流通数量
1917年	67,364,000	22,454,666
1918年	115,523,000	19,389,000 (34,587,818)
1919年	163,600,000	37,066,000 (58,547,098)
1920年	114,034,000	42,342,000
1921年	134,360,000	46,775,000
1922年	100,544,000	34,251,000
1923年	110,233,000	39,174,000
1924年	129,113,000	45,190,000
1925年	120,540,000	42,190,000
1926年	110,939,000	33,829,000
1927年	124,527,000	43,584,000
1928年	132,444,000	46,355,000
1929年	118,701,000	41,543,000
1930年	90,615,000	31,625,000

【注：1918至1919年的朝鲜银行金票在中国东北地区流通量中括号内的数字，选自张家骧著《中华币制史》，第276-277页。这个数字相对比较合理。】

首先，从流通量和发行额度来看，自1924年开始，金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量得到缓慢恢复和发展。到金国宝1927年6月调查时，金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量已占其发行总额的半数以上。³⁹⁾ 据“满铁”较为保守的统计：1929年时，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中国东北者，为金圆票4154.5万元、银元票597.1万元，按当年汇率折合中国货币5856万元，占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流通货币总额的约二成；1930年时，流通于东北各地的金圆票为3162.5万，银元票为521.8万

38) (日)荒木光太郎.1933,《货币制度概说》,东京:日本评论社,第612-613页;张家骧.2017,《中华币制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276-277页。

39) 金国宝.1928,《中国币制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36页。注:在金国宝的调查中,金票“在东三省之发行额”达75,122,549元。与其它统计资料的数据相比,此额度较高,但大体反映了金票此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情况。同时,金票在某地的流通情况也受金融季节的影响,不同月份中在某地的流通额度有变化。

元，按汇率折合中国货币6722.3万元，占中国东北地区流通货币总额的二成半以上。⁴⁰⁾ 日本学者荒木光太郎认为，1930-1931年朝鲜银行的纸币流通数量，约占当时中国东北地区通货流通总额的1/6。⁴¹⁾ 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认为，当时朝鲜银行金票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渗透愈加严重。1929年时，各种日币在中国东北的流通总额折合成中国货币约为10600万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东北各官办银行货币发行总量的4倍，占东北流通货币总量的36%以上。⁴²⁾ 其中，以朝鲜银行金票的势力最大，1932年时约占中国东北通货流通总额的四分之一。⁴³⁾ 当时，朝鲜银行券流通于中国东三省者“计七千至八千万元”，约占其发行总额的近六成。⁴⁴⁾

其次，从存贷款占比上看，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金融机构极力开展存款业务，日方各机构的存款额占当时中国东北各类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近七成，而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在其中分别占11.4%和19.7%(参见表<4>)。同期中，就贷款情况来看，日本金融机构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有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中占约五成半，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分别占总额的6.1%和12.9%。

40) 姚会元.2008,《日本对华金融掠夺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出版社,第69页。

41) 荒木光太郎.1933,《货币制度概说》,东京:日本评论社,第612-613页。

42) 陈绍贤.1935,《中国问题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29页。

43) 献可.1958,《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44) 《朝鲜银行纸币发行额》,1931,《中央银行旬报》3(16),第5页。

表<4>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东北地区金融机构存贷额度比较表⁴⁵⁾

(单位:万元)

类型	存款额	占比	贷款额	占比
中方金融机构	7,720.8	31.1%	16,664.3	40.5%
日方金融机构	16,086.6	68.9%	21,000.3	59.5%
其中:朝鲜银行	4596.2	19.7%	5318.1	12.9%

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十余年间,相对于本地区中方金融机构发行的货币,朝鲜银行券的价格一直较高,且其与中方货币的比价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参见表<5>)。当时,一些有智识的中国商民已意识到日方货币扩张势力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并指出,作为对华正式侵略的前导,日本金融机构已经“垄断了满蒙货币的势力”。⁴⁶⁾在朝鲜银行面临着内外困扰之时,朝鲜银行券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通仍能得以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北本土货币如奉票等的信用缺失及国际市场上金银货币比价变迁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表<5> 1921-1931年中国东北地区主要币种对金票百元比价表⁴⁷⁾

年份	奉票(元)	吉林官帖(百吊)	黑龙江官帖(百吊)
1921	139	9,240	6,590
1925	168	13,600	16,060
1926	359	16,500	25,170
1927	957	18,060	13,260
1928	2,510	18,000	35,510
1929	5,683	20,740	43,760
1930	10,057	34,342	85,990
1931	13,483	77,618	305,020

45) (日)松野国治.叶晓林摘译.杨枫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金融机构(续完)》;辽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5年第5期,第61页。

46) 姚孟年.1929,《东北金融之危机及其救济方法》,《东三省官报号经济月刊》1(4),第40页。

47) (伪)满洲中央银行.1942,《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长春:(伪)满洲中央银行,第6页。

发行并维持奉票的价格曾是张作霖稳定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在奉系集团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奉票逐渐成为实现张作霖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的主要经济工具之一。奉票的大规模财政性发行（参见表<6>），使得奉票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到1925年12月时奉票价格已经跌至2.6元兑换现洋1元，与1924年相比已跌落了约三成。⁴⁸⁾ 1926年上半年，奉票价格的下跌速度进一步加剧。4月左右，金票1元可兑换奉票4.8元，7月就跌至5元。奉天省政府被迫采取极为严苛的措施，企图通过强制手段，改变东北货币市场已经出现的金票逐渐取代奉票的局面。1926年10月，省政府发布政令，宣布以奉票为本位币，本省的税款、铁路、公路等收入一律折收奉票，商民租购房屋亦需用奉票交易。可是，当时奉票的信用极低，所有政令实际上成为一纸公文，市面一切交易几乎全部改以现大洋或金票为本位，民间以及政府交易都暗地里使用现洋或金票，即使用奉票纳税也必须按照当日市价进行折扣。在这种局面下，1927年12月，奉省政府宣布废除了实行一年左右的以奉票为本位的政令，宣布税收等一律改收现大洋。奉票的信用丧失也使得东北金融货币市场出现了大换洗，金票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渗透进一步加深。

4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 198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1912-1927)》,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851页。

表<6> 1922至1928年金票与奉票的发行额⁴⁹⁾

(单位：元)

时间	金票发行总额	奉票发行总额
1922	100,544,864	-----
1923	110,233,068	-----
1924	129,118,713	195,041,000
1925	120,540,782	440,413,000
1926	110,936,531	435,000,000
1927	150,843,756	641,000,000
1928	165,000,000	815,000,000
1929	—	992,000,000

注：奉票的发行额度包括大洋票和小洋票的发行额度之和。

此外，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东北各省严禁外地纸币流入，对现洋和现洋票等管控极为严格，每天的汇兑总量也都有严格的控制。因此，作为在南满铁路沿线及附属地可以自由流通且在中国东北地区随意兑换的保值货币——金票，就成为东北各地间贸易和流通的首选。

除了与奉系当局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有直接关联外，金票这一时期在东北地区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上的金银价格变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战之后，世界银价频繁暴跌，金价持续上涨。在此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的金票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持续扩张是自然和必然的结果。随着奉票价格的逐渐跌落，大量的商人百姓开始抛售奉票，购买金票，力图避免因为金银价格波动而造成的损失，金票在东北地区逐渐成为一种被认可的保值货币的存在。“金融既有一次之恐慌，一般人对于国币券（大洋票）咸抱危险，为图资金之安全，免受票券跌价之损失，多以日本纸币、金票存放于朝鲜、正金两行。”此外，在金涨银跌以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恢复或者实行金本位制的国际大环境下，“东省对外贸易

49) 姚孟年.1929,《东北金融之危机及其救济方法》,《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4),第12页,第16页。

所有英镑、美金之期、现行市，直接以金票为标准，又上海、天津款项之调拨，亦有东汇标金之行市可以直接办理，故自商民视之，金钞汇兑即称便利。”⁵⁰⁾ 甚至随着金票势力的不断扩大，“金票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满洲不同城市间和满洲与华南间调拨资金的媒介。”⁵¹⁾ 这种特殊的用途是中国东北本地纸币所不具备的，让金票的信誉更上一层楼，也成为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和商人愿意持有的货币种类之一。

但是，朝鲜银行的高额债务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截至1927年3月底，朝鲜银行的不良债权额仍高达贷款总额的60.5%，亏损预计比例为35.6%；其中，中国东北地区的不良债权比为68.8%，亏损预计比例为38%（参见表<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不良债权的一半左右都集中在大连。这也使得金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发行与流通情况远低于预期，也无力通过流通渐有复苏的朝鲜银行券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金融与财政。

表<7> 1927年3月末朝鲜银行亏损数额表⁵²⁾

(单位：元)

地区	总贷款额	不良债权	不良债权中的亏损额
朝鲜	61,878,163.32(100%)	20,154,031(32.6%)	13,352,564(21.6%)
日本	110,911,432.79(100%)	83,550,290(75.3%)	51,594,825(46.5%)
东北	118,952,285.98(100%)	81,831,578(68.8%)	45,174,019(38%)
其他地区	20,717,314.76(100%)	3,608,603(17.4%)	1,299,266(6.3%)
总计	312,459,196.85(100%)	189,144,503(60.5%)	111,420,674(35.6%)

50) 晋笙.1929,《金钞之现势》,《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3),第5-7页。

51) 侯树彤.《满洲的日本银行钞票》,《燕京政治科学学报》1931年第6期,第5页。

52) (日)柴田善雅.1977,《日本の対「満州」通貨金融政策の形成とその機能の実態--第一次大戦から二〇年代中頃にかけて》,《社会経済史学》43(2),第169页。

III. 结语

对于列强来说，在其他国家能够发行货币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可以为其本国直接获取原材料、商品和劳动力，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国库支出，还可以成为在殖民地全面开展经济侵略的有力武器。日本已经在强行统治朝鲜的过程中证明了它的有效性，也企图在势力扩张时向中国东北地区推行这一计划，甚至妄图通过这一计划实现对中国东北经济的控制。

因此，围绕这一计划，日本殖民势力制定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满洲”货币金融政策的基本框架，并于1917年由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制定了具体内容。在提出立案时，胜田明确指出，在中国东北使用金票就是为了“先用金统一满洲，渐次之，达到支那（中国）全国”⁵³⁾。换言之，日方企图利用金票实现从“满洲”统一的金本位到中国全境统一的金本位。而且，在中国东北地区金票的发行也是大多数日本国内工商业者的强烈诉求。在日本商业会议所联合会的《关于在满蒙地区普及金建制交易的建议》中，要求大连的各交易所均采用金建制，并在“满洲”发行小额现金券。其理由是：“现在的中国政府不应该期待币制改革。我国（指日本）主张，首先应在满蒙扩大实际金券的流通，采取措施推广黄金交易。在满蒙推广金券，这些也是我国（指日本）贸易和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⁵⁴⁾

对于在华外商银行所发挥的作用，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曾提出“隐性中央银行”⁵⁵⁾的概念。清末民初之际的大型在华外商银行多自主

53) (日)勝田竜夫.1972,《中国借款と勝田主計》,东京:ダイヤモンド社,第131頁。

54) 《滿蒙地方に於ける金建取引普及關する建議》,《滿蒙實業集報》1917年第11期,第21頁。

55) 戴建兵.《隐性中央银行：甲午战争前后的外商银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地发行纸币，且因为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附加政治性或经济性条款的巨额借款而成为“政府的银行”。相对于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来说，近代外商在华银行的实际职能虽未曾完全覆盖，但它们侵扰了所在国家与地域的金融主权并为其金融掠夺活动服务的事实却无可争议。朝鲜银行于设立之初就具有相当意义的殖民性。日本殖民者大肆推广朝鲜银行券，使其在中国东北地区泛滥，不仅侵扰了中国本土的货币体系，也给当地商民带来了极大伤害。当金票的价值不稳定时，本地商人的债务问题愈发明显，大批商户破产，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商业活动。而且，金票的出现让大量投机分子看到了利益机会，投机行为频发，扰乱市场运行。当本地的银本位纸币价格出现波动时，朝鲜银行金票的相对稳定更加剧了中国东北地区币制的分层与波动。最重要的是，金票的大规模发行破坏了中国的货币发行主权，扰乱了东北币制，以保护日本商民在华利益为借口，加剧了对华财富掠夺。

上世纪20年代初，受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企业衰退等因素的影响，朝鲜银行自身的利润率降低，债务负担增加，进一步加速了其经营状况的恶化，使其难以按期偿还原有债务，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攀升，又导致了其经营能力的下滑，⁵⁶⁾也使得该行在中国东北地区未能完成日本政府所要求的控制地方财政的任务，进而“日满支经济圈”的战略也基本宣告失败。这也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朝鲜银行积极参与了伪满洲中央银行的组建。之后，因为日本金融侵华战略的调整，伪满洲中央银行和“满洲国圆”取代了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法定货币”的

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77页。

56) (日)柴田善雅.1977,《日本の対「満州」通貨金融政策の形成とその機能の実態--第一次大戦から二〇年代中頃にかけて》,《社会経済史学》43(2),第145-173页。

地位。但是，伪满洲中央银行券（即“满银券”）仍“是以白银为价值基准的不兑现纸币”。⁵⁷⁾ 1936年11月18日，日本大藏省决定让朝鲜银行撤出中国东北，朝鲜银行结束了长达30年的在该地区的活动，该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相关产业被伪满洲兴业银行继承。⁵⁸⁾ 此后，朝鲜银行的经营与渗透重心，放到了中国华北以及沿海的其他省份。

투고일: 2024.05.04. 심사완료일: 2024.06.13. 게재확정일: 2024.06.24.

57) 燕红忠·许晨.《日本不同殖民集团对我国东北货币本位政策之争(1906-1933)》,《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4-105页。

58) (日)高承济.1971,《大陸政策の展開過程に於ける朝鮮銀行の役割》,《社会経済史学》

| 参考文献 |

1. 专著图书

- 《吉林金融研究》编辑部.1987,东北货币史,长春(《吉林金融研究》专刊).
- 陈绍贤.1935,中国问题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
- 邓焕文.1995,哈尔滨市志·金融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哈尔滨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九辑:金融专辑,哈尔滨(内部发行).
- 贾士毅.1934,民国续财政史(六),上海:商务印书馆.
- 姜建清.蒋立场.2016,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北京:中信出版社.
- 金国宝.1928,中国币制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 曲振涛.张新知.2007,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献可.1958,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燕红忠.2021,中日货币战争史(1906-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姚会元.2008,日本对华金融掠夺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出版社.
- 张家骧.2017,中华币制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1986,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2013,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国际秩序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伪)满洲中央銀行.1942,满洲中央銀行十年史,长春:(伪)满洲中央銀行.
- 滿洲事情案内所.1936,滿洲に於ける通貨金融の過去及現在,长春(新京):滿洲事情案内所报告(滿洲事情案内所报告36).
- 朝鮮銀行.1919,鮮滿經濟十年史,首尔(京城):朝鮮銀行.
- 朝鮮銀行.1934,朝鮮銀行二十五年史,首尔(京城):朝鮮銀行.
- (日)高久敏男.1915,朝鮮銀行五年志,首尔(京城):朝鮮銀行.
- (日)池田龍藏.1925,朝鮮經濟管見,大阪:巖松堂.

- (日)荒木光太郎.1933,货币制度概说,东京:日本评论社.
- (日)松原纯一.1939,朝鲜银行三十年の回顾,首尔(京城):朝鮮銀行調査課.
- (日)勝田竜夫.1972,中国借款と勝田主計,东京:ダイヤモンド社.
- (日)日本外务省.1978,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东京原书房.
- (日)朝鮮銀行史研究会.1987,朝鮮銀行史,东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日)多田井喜生.2020,朝鮮銀行ある円通貨圏の興亡,东京:筑摩書房.

2. 期刊论文

- 戴建兵. 2007年第3期,“隐性中央银行:甲午战争前后的外商银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文春美.2021,“寺内内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与西原借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0(3).
- 吴树实.2015年第6期,伪满洲中央银行与‘朝鲜银行’货币发行制度之比较研究”,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燕红忠.李裕威.2019,“外国纸币何以能在近代中国长期流通?——东北竞争性货币市场及其启示”,财经研究45(9).
- 燕红忠.许晨. 2018年第5期,“日本不同殖民集团对我国东北货币本位政策之争(1906-1933)”,历史研究.
- (日)柴田善雅.1977,“日本の対「満州」通貨金融政策の形成とその機能の実態—第一次大戦から二〇年代中頃にかけて”,社会経済史学43(2).
- (日)高承济.1971,“大陸政策の展開過程に於ける朝鮮銀行の役割”,社会経済史学37(4).

3. 书籍章节或论文集

- 安国祥.张曾编.<关于日军在哈使用军用手票问题的呈>; 哈尔滨市档案馆,1991,《哈尔滨经济资料文集(4):金融·财政》,哈尔滨:内部发行.
- (日)松野国治.叶晓林摘译.杨枫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金融机构(续完)>,辽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5年第5期.

(日)山内胜雄.1923,<哈尔滨金融机关现状>; 哈尔滨市档案馆,1991,《哈尔滨经济资料文集(4):金融·财政》,哈尔滨:内部发行.

4. 民国期刊

“朝鲜银行纸币发行额”,1931,中央银行旬报,3(16).

“滿蒙地方に於ける金建取引普及關する建議”,滿蒙實業彙報,1917年第11期.

侯树彤.“满洲的日本银行钞票”,燕京政治科学学报,1931年第6期.

晋笙.1929,“金钞之现势”,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3).

姚孟年.1929,“东北金融之危机及其救济方法”,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4).

5. 报纸

1920.8.3,“杂纂:东三省日本人之经济政策”,银行周报4(28).

1921.1.18,“各埠金融及商况:北满(華商所受金票之損失)”,银行周报5(3).

1922.3.13.(3),“大连金建牵动日本政局”,民国日报.